

新闻传播学译丛

普利策奖

The Pulitzer 纪事

Diaries——美国最大的奖金透视

*Inside America's
Greatest Prize*

[美]约翰·霍恩贝格 著 赵仲强 译

John Hohenberg

新华出版社

普利策奖纪事

美国最大的奖金透视

[美] 约翰·霍恩贝格 著

赵 仲 强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利策奖纪事：美国最大的奖金透视/（美）霍恩贝格著；赵仲强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3

（新闻传播学译丛）

ISBN 7-5011-4351-X

I. 普… II. ①霍…②赵… III. ①新闻奖-纪事-美国②普利策奖-纪事 IV. 6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3966 号

The Pulitze Diaries:

Inside America's Greatest Prize

Copyright © 1997 by John tlohenber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i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普利策奖纪事

美国最大的奖金透视

[美] 约翰·霍恩贝格 著

赵仲强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302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一版 1999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351-X/G·1610 定价：22.00 元

纪事的艺术

在毕其一生为美国舞台写出了不可磨灭的歌词之后，奥斯卡·哈莫尔斯坦第二总结说：“在撰写歌词时，没有一成不变的和无可避开的方法。”

对于纪事的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对一首歌里的少数音符或歌词稍加修改，就可能使人受到鼓舞。有远见的纪事作者，常常能够改变一下他们的手法或增添一些新的情节，而把他们的社会更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此。所根据的材料是我主管普利策奖22年中的纪事和笔记。我所作的工作，等于是把这些年中为控制普利策奖而进行的斗争和遴选获奖者中众所周知的事实，加以完整化。在为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水门事件、越南战争而颁发的普利策奖中，以及颁发给诸如约翰·肯尼迪和威廉·朗道夫·赫斯特的奖金中，我的工作和最后看法也是如此；我也没有忽略拒绝授予埃林顿公爵以同样荣誉的事实。

即使我的所作所为或者无所作为，不管对哥伦比亚大学我的上级或者普利策董事会来说，都没有什么秘密，推迟公开述说这些事情则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

这不是说，我们纪事作者像我们的更为严肃的伙伴——历史学家、传记作者、社会学家等——一样，总是能够严于律己。纪

事作者萨缪尔·佩皮斯亲王在三个世纪以前度过一个困难的周末后曾经写道：

“饭后，我们都走到教堂的平台上，我们在那里吃东西、喝酒，我假装好像非常快乐的样子。”

那末，纪事者是否要经常把自己装扮成乐而无忧呢？我只能把这种乔装取媚视为明明白白的谎言，全然不顾纪事的基本宗旨，即要尽一切努力忠实于自己。佩皮斯在他的一些尖锐的评论里对此确有感触。他在引用法则时非常谨慎，但从不出来说话。

可是，在我这本关于我与普利策奖的长期合作的书里，我没有义务一定要运用法则。

而且在我与普利策奖的长期联系中，我并没有被要求在工作中要运用某种法则。我也没有像我的一些前任那样，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尼古拉·谬雷·巴特勒拒绝授予他所不赞成的著作、戏剧或新闻特写以普利策奖，从而陷于尴尬境地。他那时是像通常一样执行他的董事会工作的。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作为奖金的一个管理者，从没有非要就道义问题进行争论不可。在这些知名人士对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评论中，我从没有恪守美国新闻学公认的法则，即作者必须避免作严厉的人身评论。而在我早期的著作《普利策奖的来龙去脉》中，我是必须这样作的。这本书在1974年出版之前，我的一些上级充任了编辑。如像在第九版的某些篇章中所表明的，自从那时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的纪事是从1952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两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的。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将来会与普利策奖有什么关系。在1953年这些匆促草成的纪事中，我找到了提到普利策奖的纪事：

4月23日 普利策奖于今天在新闻大厦举行的秘密会议上作出了决定。我的朋友理查德·巴克尔与普利策董事会和它的秘书卡尔·W·阿克曼参加了会议。他被要求在正式宣布之前，私下告诉我谁得了奖。可是，我并没有说一声谢谢。在新闻很快就要发布之际，我对获知谁人得奖并不重视。

因此，1954年我出乎意料地被任命为奖金管理人和董事会秘书的时候，我是毫无准备的。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对我来说是如此不熟悉的一项工作。而且，身为一个大学教授，我还有日常的全部教学工作要作。这种感觉在纪事的最初一些篇章里反映出来。其后，就更关注普利策奖的事而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事了。

除了一大摞红色的硬皮纪事册之外，我还积累了一大箱小一些的纸封面的纪事簿，这些纪事簿都是我在夏季和日常教学空余之际从事官方或不那么官方的公务时使用的。

同任何与普利策奖有关的人——除了尼古拉·谬雷·巴特勒之外——相比，对这种更为长久的经历，我首先要感谢普利策董事会——那时叫做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一直让我担任他们的秘书；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各任校长一再任命我为基金的日常管理人。我还要感谢约瑟夫·普利策第一家族——奖金和普利策基金的捐助者；感谢他的儿子约瑟夫·普利策第二；感谢他的孙子小约瑟夫·普利策，除了我第一年供职的时间之外，他一直是普利策董事会的主席。除了普利策第一和他的一个健在的孙子，现任普利策出版公司头头的密歇尔·普利策之外，我在一定时期中都为他们工作过。

我还要感谢奥斯卡·哈莫尔斯坦第二、拉尔夫·麦克吉尔以及许许多多普利策奖的获奖者，他们的经历和范例对本书的设计和內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非常感谢约安·霍恩贝格，他一直激发我写作本书的兴趣，并且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向我提供完善的编写建议，并且以智慧和耐心指导我完成本书的写作。

约翰·霍恩贝格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
1996年9月

目 录

纪事的艺术	(1)
-------------	-----

第一部 拓展的视野

1. 大奖	(3)
2. 我对奖金的看法	(9)
3. 原子危机	(15)
4. 奖金的新时代	(25)
5. 对一个教员的考验	(35)
6. 在莫斯科邂逅赫斯特	(48)
7. 肯尼迪获奖	(59)

第二部 黄金时代

8. 资金问题	(73)
9. 大学的阅历	(84)
10. 为了公众利益	(92)
11. 奖金的调整	(99)
12. 总统政治	(109)
13. 报界对政府	(118)

14. 苏联的挑战 (127)
15. 摊牌 (134)

第三部 奖金的沿革

16. 最大的牺牲 (147)
17. 在亚洲进退两难 (156)
18. 奖金与越南 (165)
19. 授予公爵的荣誉 (175)
20. 五十年回顾 (184)
21. 大展示 (195)
22. 失掉一项奖金 (205)

第四部 战争的幸存者

23. 年龄最大的反对者 (219)
24. 转向 (228)
25. 国内的动乱 (237)
26. 另一个世界 (247)
27. 和平骚动 (257)
28. 肯特州立大学的悲剧 (267)
29. 罗米 (276)
30. 重访西贡 (286)

第五部 对和平的考验

31. 越战后的生活 (299)
32. 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骚动 (311)

33. 水门事件回顾	(322)
34. 奖金受到抨击	(331)
35. 奖金的分解	(343)
36. 不止是失败	(352)
37. 奥尔德·朗格·西尼	(360)
38. 南部的曝光	(369)
译者附言	(377)

第一部

拓展的视野

1 大 奖

在我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第四年快要期满的时候，我的院长要我和他一起参加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他说：“我不愿担负太多的工作”。我在我的纪事中写道，他向我提出：“麻烦你帮我作一些笔记。”

我对此很感兴趣，尤其是因为在 1954 年春光明媚的 4 月份的上午，我没有课要讲，虽然有一大堆学生的作业要审阅。没有关系，院长的工作是首要的。

院长卡尔·阿克曼一直主管新闻学院的毕业班达 20 年，同时还担任普利策奖董事会的秘书。他一向都说他热爱这项工作，但是，现在健康状况不佳，而且快到退休的时候。

在从新闻学院大楼第五层走向下面两层举行仪式的世界厅的路上，他向我说明，这次会议是普利策董事会为期两天的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可能会更多进行讨论而不是表决。他预料，大多数表决将在明天进行。

此时，他抱着一大摞卷宗—— he 说是普利策奖评审报告——和一个大本册，它的退了色的红色封面上，有一个白色的长方形格子，上面打印着“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纪录”的字样。

一走进世界厅，我马上看到一些人围坐在一张椭圆形桌子的周围，对面是一尊有色玻璃的自由神塑像的复制品，安置在像一扇窗子般的壁橱里面。至少对我来说这是熟悉的，我曾从纽约市长手里得到它，作为对哥伦比亚大学的赠礼。

在结束了 1/4 世纪的报纸工作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我最初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新闻学院争得自由神窗。这项礼品是在纽

约市的一支拆迁队拆除约瑟夫·普利策陈旧的纽约世界厅之前授予的。拆除这一建筑是为了拓宽通往布鲁克林桥的道路。在我进入世界厅之后，院长告诉我说，纽约市长罗伯特·F·华格纳明天将同我们一块来重新布置橱窗。

可是，现在显而易见，围坐在椭圆形桌子周围的普利策董事会的12名董事显然希望开始工作。当天的书记员阿克曼院长，对我作了简要的说明，然后就坐到了会议主席、奖金创立者之子约瑟夫·普利策第二身旁的一张椅子上。普利策第二是一个年老的大块头，带着深度的眼镜。像主席一样，董事会的其他10个成员对我一点也没有给予注意。惟一熟悉的面孔是第12位董事、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

主席普利策宣布开会后，上午对阿克曼院长从他所携带的卷宗里概括出来的评审报告，进行了快速的讨论。讨论涉及报告的各个方面。评审委员会各成员提出的一些意见是，报告的不足之处是，随着小说创作的下降，而忽略了对美国文学的评奖，这种想法的根据是，评审委员会没有提出对上一年小说创作给以奖励。可是，尽管评审委员会许多成员就他们读过的一些小说提出了建议，评审委员会“不设奖”的决定仍未改变。

对于戏剧评审委员会关于授予一出轻喜剧《八月月光下的茶室》以奖金的建议，也引起了同样的不满。这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剧作家约翰·帕特里克的的作品，在剧院上演时观众不及剧场座位的一半。可是，评审委员会的报告仍坚持授予奖金。

这些细节不是根据多年后对往事的奇迹般的完整的追忆；而是来自于我为阿克曼院长所作的札记，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此也作了概述。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对我的秘书工作因椭圆形桌子周围的妥协而造成的困难，总是非常关切的。但是，除了阿克曼院长之外，别人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

院长总是时不时地以可亲的低声对我说，虽然要到明天才进

行表决，他希望我能把这次会议的纪事写出来。还未等我的纪事写完，第一天的会议就结束了，董事会的成员纷纷散去。在普利策彬彬有礼地向我们说一声谢谢，再见，而离去之后，我和院长起身回我们的办公室去。

在我们去五层楼时乘坐的电梯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由于事发突然，我当时并没有注意，但仍然活灵活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阿克曼院长不是自己把那大摞普利策评审报告的卷宗和那本红色封面的普利策董事会纪录抱回他的办公室，而是一言不发，把它们通通塞到了我的怀里。恰好这时候五层楼的电梯门开了，他沿着走廊匆匆向他的办公室走去，好像后面有个魔鬼在追他。

我一时不知所措，把这些文件和纪录带回了我的办公室，把它们放在一边，然后想集中精神阅读和评判最近的学生作业。可是，我心神不定，而且揣摸不透院长的行动。

第二天上午，当我再次在世界厅参加普利策董事会会议的时候，阿克曼院长不知去向，他的位子空着的。会议主席普利策好像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示意我坐到他的旁边。当我坐到院长前一天所坐的位子上时，我觉得别人都用惊异的目光注视我，只有校长柯克除外。他高兴地点点头，好像是给以鼓励。

像我在札记中所追述的一样，然后，会议主席普利策平缓地说：“秘书先生，开会吧。”我不知道应该作什么，于是，尽可能谦恭地问道：“主席先生，你要我怎样主持会议？”这在包括主席在内的与会者中，引起了一阵轻微的欢笑声。

约瑟夫·普利策第二用拇指和食指扶了扶他的眼镜，向我说明了有关他的先辈的一些我应该知道而却不知道的情况。他说，由于家族的遗传，我的视力很差，因此，我必须仰赖你来宣布对各项主题进行表决，对评审委员会的有关的评审报告，作一简要说明，弄清楚每个委员会的不同意见，然后请他退出会场。其余的

事由我来作。

我再次看到柯克校长微笑着点点头，然后就遵照主席的指示主持会议，而几乎没有注意到阿克曼院长的缺席。这时候，对于我来说，院长也许是随便一说的要我担任普利策董事会会议纪录员的邀请，不管可能是事出偶然，或者是经过认真考虑，都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作冷静的考虑。

主要是由于 25 年来在报道新闻或者在限期之前写出轰动的报道方面受到的严格训练，我遵照普利策主席的指示，介绍了各项奖金的要点。然后，他主持进行了讨论，并以庄重而值得赞扬的坚决的态度提请表决。

小说奖最后是照评审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除此之外，我对其它没有异议。戏曲奖授予了评审委员会推荐的《八月月光下的茶室》，勉强获得通过。而布鲁斯·卡顿所著《阿波玛托克斯静悄悄》一书获一致通过授予历史奖；西奥多·罗伊茨基所著《觉醒》获诗歌奖。

但是，传记评审委员会推荐的作品，查尔斯·A·林德伯格所著《圣路易精神》引起了短暂而不愉快的沉默，天哪，当时好像给了会议主席当头一棒，他也是圣路易《快邮报》的编辑和出版人。我无能为力帮助他；事实上，我模模糊糊怀疑他是不是评审委员会的有关的一方；但是，我决定除非他自愿离开会议厅，不采取行动。

引起争议的一本书描述了 1927 年 5 月 20 日—21 日，一位飞行员第一次作从纽约到巴黎横渡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这本书是以他所驾驶的那架小飞机的名字为书名的。27 年之后，这本书里描述了那次飞行的经过。可是，我迅速扫视了一下桌子周围，我看到人们对评审委员会的选择产生疑问。我确信普利策主席也出于同样原因而犹豫不定。

根据猜想，我怀疑这种反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林德伯格作

为一个孤立主义者所持的模糊观点有关；不然就是由于他对美国报界的不加掩饰的敌视。对于前一点，我只有模糊的记忆；而对于在1935年采访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因杀害林德伯格幼儿一案进行审讯时，飞行员敌视报界的态度记忆犹新。

我记得，在新泽西州的弗莱明顿审讯现场，摄影记者天天不辞辛苦地在审讯前后追逐着林德伯格和他的妻子进行采访。后者从前的名字叫安娜·莫罗。有一个场面一直在我眼前难以消逝：林德伯格在各排着两排摄影记者之间的道路上走回家去，他弯着腰，用一件外套蒙着头，腰弯得只能从摄影记者的脚面上看到相机。他怒不可遏地离去，使得人们除了他战前对纳粹德国的访问外，再难找出什么理由反对他的书。不管林德伯格经常惹起众怒、特别是新闻界的愤怒的原因是什么，编辑们摒弃了他们明显的偏见，同意授予他的作品以传记奖。音乐奖授予了昆西·波特。

新闻奖中有些没有遵照评审委员会的建议，但结果看来是可信的。长岛《新闻日报》揭露赛马场丑闻的报道被授予公众服务金奖。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的一家报纸因其通栏报道而获奖，《费城公报》因揭露了一连串骗局而获奖，《得梅因纪事报》因报道了联邦调查局忠诚审查的结果而得奖。另外有三个人也获得奖金。老新闻工作者吉姆·卢卡斯因其战争报道而获奖；《华盛顿邮报》的赫尔布洛克因其漫画而获奖；一位业余摄影者因拍摄了水上救援的镜头而获奖。我在日记中写道：

4月23日 有时候，人会遇到一些美好的时光。今天就是我最美好的日子。由于院长阿克曼缺席，我以普利策董事会的秘书行事，代表董事会主席约瑟夫·普利策主持了会议。在世界厅里，柯克校长坐在我们对面椭圆形桌子的旁边。

看来好像我工作得很好，因为他们选举我接替阿克曼